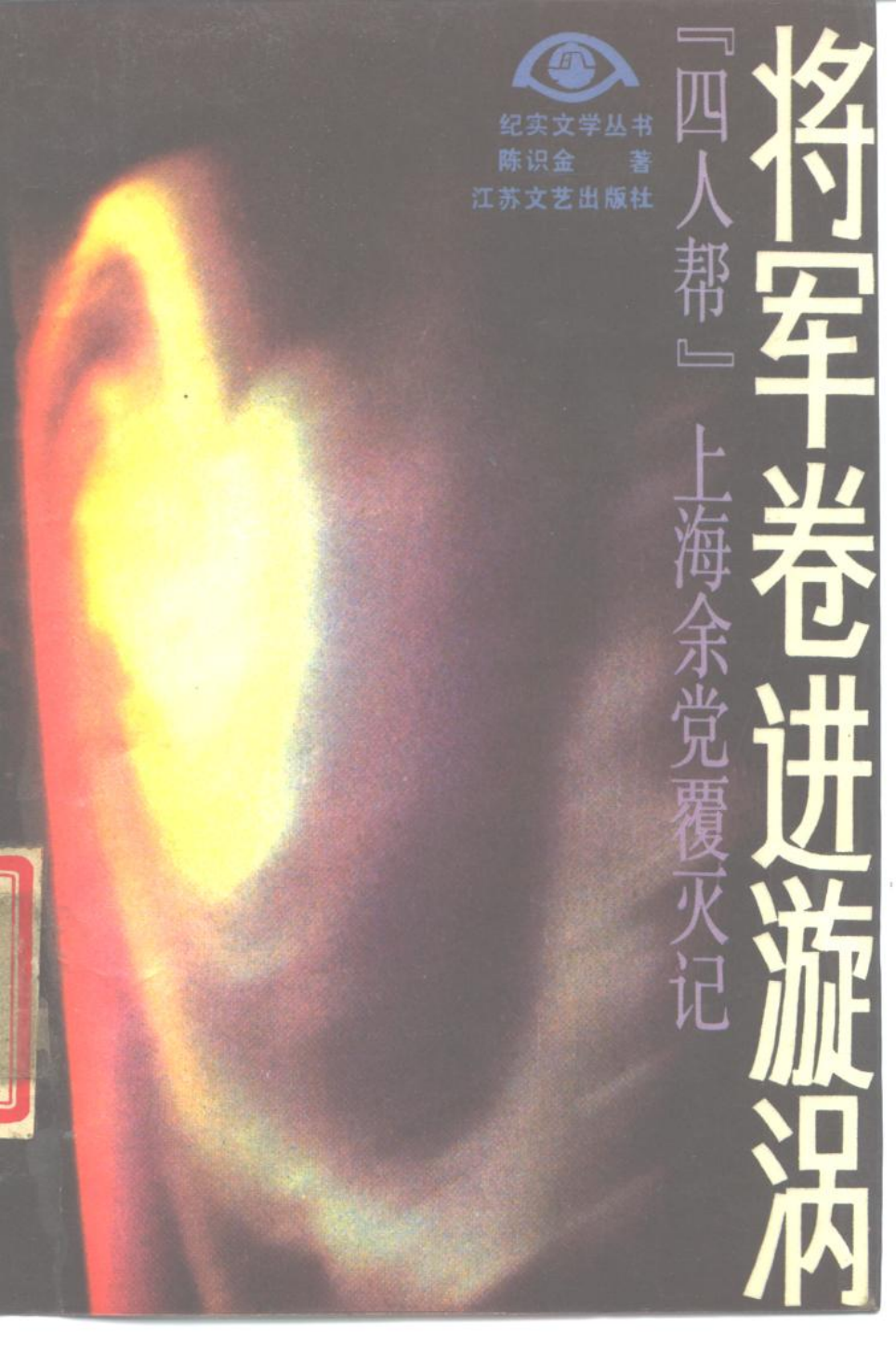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
纪实文学丛书
陈识金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『四人帮』上海余党覆灭记

将军卷进漩涡





将军卷进漩涡

纪实文学丛书8

陈识金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将军卷进漩涡

陈识金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正文印刷：东台县印刷总厂 封面印刷：南通县印刷总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375印张 2插页 138千字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20,000册

ISBN 7—5399—0003—2/I·1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47 定价：1.40元

责任编辑 李荣德

将军卷进漩涡

第一章

· 卷进漩涡 ·

上海。

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元旦。

急促、刺耳的哨音震破了上海警备团干部、战士们的好梦。

从第一声哨音响起，到最后一名战士入列，这一次紧急集合仅用了四分三十二秒。

三排整齐的刺刀，在凛冽的寒风里熠熠闪光——好一支铁一般坚凝的队伍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有什么新的重要任务？战士们对元旦之夜的紧急集合疑

惑不解，用探询的目光看着连长。团长来了，操场上响起了他那洪钟般的嗓音：

《紧急命令》——

……为了及时检查和维修武器装备，务必在三日内将全市民兵手中的枪支收缴完毕！……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……”

上棉厂民兵武器仓库的门口，一个造反派头头拦在那里，嘴里不停地嚷着，说什么也不肯打开门上的铁锁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一个战士端着刺刀向前一步，逼问着。

“没有我们王司令的命令，就是不行！”那个造反派头头后退了一步，颤兢兢地说。

“哪个王司令？”战士们不解地问。

提到王司令，那个造反派竖起大拇指，得意洋洋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洪文司令！”

连长用蔑视的口吻说：“我以为是哪位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原来是王洪文，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的王干事。他有什么资格下命令？！”他上前两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举到那个造反派头头的眼前说：“看看！这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命令，这才管用！你开不开锁？”

“不……”那个造反派头头看看眼前目光严厉的战士，又看看楼前停着的一排摩托车和军用卡车，咽回了后半截话。但是，仓库门上的钥匙，他仍紧紧地攥在手里，怎么也不肯松开。

“一排长！”

“到！”

连长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先礼后兵，既然他不肯开锁，那咱们就砸！”

“当啷！”随着连长的“砸”字出口，一枪托上去，仓库门锁“咔嚓”一下掉了。

战士们涌进去，把枪支、弹药全部搬到卡车上。

“走！”汽车卷起一道疾风走了。那个造反派头头无可奈何地望着消失在街巷尽头拐角处的车队，象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坐在石沿上。

上海北站。

三个战士正对几十个刚下火车的红卫兵，宣读《布告》——

……外地造反派的同志们，红卫兵小将们：

……为了保证你们和人民的安全，请你们下火车后把携带到上海的枪支，交给车站执勤的战士保管。等你们上火车离开上海时，我们一定将枪支如数归还你们。望各位遵照执行……特此通告。

上海警备司令部

多数红卫兵看了《布告》之后，开始把身上的枪支交给执勤的战士。但是，还有一些红卫兵犹豫不决。其中有一个悄悄地对身旁的同伴说：“把枪交给上海警备区，我们副司令知道了怎么办？”

“是啊，临离开北京时，我们谭司令还特别交代，枪是红卫兵的第二生命，要象保护眼睛一样的保护武器。”又一个红卫兵喃喃地说。

“哎呀，算了吧，什么副司令、谭司令，回北京，听他

们的；现在在上海，就得听人家廖司令的！”一个年岁稍大一些的造反派大声地说。

她见那几个红卫兵仍然犹豫不决，又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看看四周，不把枪丢下，走得了吗？”

那几个红卫兵不约而同地用眼睛看了看四周执勤的战士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还是悄悄地把手中的枪支放下了……

十六铺码头。

一艘客轮刚刚靠上码头，宣传车喇叭里立即响起了浑厚而洪亮的声音，把上海警备区廖司令一月一日签发的《布告》送进每个旅客的耳鼓里。

《布告》具有无上的威慑力，它真正的反映了人民的意志。一批又一批背着各种枪支的造反派和红卫兵，几分钟前还飒爽英姿，不爱红装爱武装，现在却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身上背的枪支取下来，悄悄地放在宣传车旁。

船上，有三个臂戴“长鹰”袖章的造反派迟迟不肯下船。他们嘀咕了一阵，悄悄上岸，躲在码头的拐角处，举枪向宣传车上的喇叭瞄准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三个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跃进、出掌，三支枪震落在地。三个家伙在战士严厉目光的逼视下，乖乖地把枪支从地上拾起来，向着宣传车旁的枪堆走去……

“军令如山”，坚决执行命令的自觉性来自于教育和养成。前面是刀山，是火海，有千难，有万险，战士们也会毫不含糊地去蹒、去闯，这就是战斗力。有人说他们“盲从”，然

而我军的许多胜利，不正是靠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去夺取的吗！上海警备团的许多战士们，也许一时还理解不透发布《紧急命令》、签发《布告》的深刻背景和重大意义。但是，他们严格按命令办事，竭尽全力去执行，仅仅用了两天半时间，就将全市民兵数以十万计的枪支，全部收缴完毕，秘密封存起来。

收缴民兵武器，这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刻，在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”的强大思潮下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，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。那么是谁具有这样的胆略作出这一决定？承担巨大的风险？

几天前的一个下午，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走来一个很不惹人注目的普通汉子，他穿着一身不佩领章帽徽的旧军装，右臂只有一只空袖筒，看模样似乎是一个到上海来看稀奇，挤热闹的残废军人。不过，如果细心的话（当然，谁会有这个闲心？）不难看出此人决非等闲之辈，因为不仅从他犀利的目光，从他稳健而沉重的步履，从他眉宇间透出的气质，而且从他身后紧紧跟随的年轻战士的警惕的神色，就可想见他的身份，他这次上街并非无事闲逛，而是有目的地观察动态，观察形势。

是的，这个独臂人正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！

南京路上人流似潮，仿佛全部上海人都涌到马路上来了。“停工闹革命”，“停学闹革命”，这就是革命？！廖政国的眉峰越蹙越紧。冷不防，一个中年男人扛着一大包毛毯撞到了他的身上，两人都打了个趔趄，警卫员赶紧上前扶住了他。他定睛一看，中年男人的右臂上戴着“工总司”的袖

章。那人十分傲慢地白了廖政国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瞎了眼啦？看勿见阿拉是工总司的？”

廖政国笑笑。

也许这笑容使那人产生了好感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“工总司”的袖章，笑嘻嘻地对廖政国说：“不要眼红，你把它套上，照样可以去拿！革命需要么！哈哈！”

廖政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三五人，数十人，成百人……越来越多的人，越来越快地在马路上奔跑。他们争先恐后，唯恐错过了机会。一些人手中的大包裹，对另一些人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。

有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有的人瞪大眼睛四下搜寻，有的人丢下不大值钱的日用百货，又去抢人参、鹿茸、天麻、手表、收音机……有的推开劝阻人员，一边拖着地上扛不动的大包一边喊：

“快去！人家都在拿……”

“快跑！东西都被拿光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，快拿呀！……”

喧嚣的声浪中，造反派的手已经伸向了国家的商店、仓库、机关……一股解放后从未发生过的哄抢风潮正在掀起……

廖政国看到这些，怒不可遏，他把左手插到口袋里，五个粗大的手指握住了那支五四式手枪，警卫员看出他脸色铁青，走上前来，拉了他一把。廖政国松开了手，手心满是汗水。他痛心啊！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“反修防修”？这就是“造反有理”？

他气愤地离开了现场。五点半左右，他来到了外滩。

一阵吵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门口，几个银行干部被人揪住。他们可怜巴巴地解释着什么，然而，不时被横眉怒目的造反队员打断：“不要做口头革命派，我们不是阿斗！”“不给钱，阿拉就不走，睡在门口，拉在门口，你们也勿要想回家！”“今朝钞票不到手，就砸扁你的狗头！”

“革命无罪！造反有理！”在几个造反队员的鼓噪下，门口的造反派们立即狠命地踩着台阶，有节奏地呐喊着：“革命无罪、造反有理！”……

一位老工人悄声地告诉廖政国：“这几天，从早到晚，一直这样，大把大把的钞票，都被人从柜台里面捞跑了。这样下去，国库要被掏空的，这怎么得了噢！……”

银行大厦是由黑色花岗岩砌成的，雄伟，牢固，仿佛是座坚不可摧的石堡。

可是，一个瘦高个却钻了铁栅的空子。他攀上铁栅门，用一只手一只脚勾住铁栅，亮出他那粗野的嗓门，煽动性地吼道：“造反派的战友们！王司令早就说过要发造反费，银行迟迟不发！扣压我们的造反钱，谁想卡住我们的脖子，一万个不答应！有种的，跟我冲！……”

廖政国对这个煽动冲击银行的造反者，再次握枪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个家伙有罪，但根子何在？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后台是谁？他知道面对这一群捞钞票已经捞到快要发疯的人们，一支枪，几颗子弹，是震慑不了的，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骚乱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左手又松了开来。

“冲啊！”人群中发出一声呐喊，汹涌人流冲开了铁栅门。疯狂的潮头一下子涌到了营业柜台的出纳窗口。

数不清的手舞动着支票，数不清的嘴在狂喊乱骂，数不清的眼睛喷射着贪婪的火焰……

一张张支票从窗口塞进去，一把把钞票从窗口扔出来；捞着钞票的造反派还没有从铁栅门口挤出去，没有捞着钞票的就涌了进来。

一个银行干部苍白的脸上布满了忧郁的神色，他双手压着额头上稀疏的头发，长叹一声：“这么造反怎么得了！三天不到就提走了几百万元！金库快要空了！从来没见过，这那里是提款，简直是在抢！疯了，疯了，真是疯了！”

“市委怎么不管？”一个老工人悄悄地问。

“管？谁敢管？市委，市委的负责人不都被造反派抓起来批斗了吗？连财政部长也不知道被造反派关到哪里去了！”

老工人与这位银行干部面面相觑，忧心似焚。

过了一会，那位银行干部含着泪花，焦虑地说：“如果这种局面再延续十天，大上海就将是一座财政枯竭的空城！”

廖政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的眉峰紧紧锁起，眉毛一根根都竖了起来，就象两把利剑。他的心潮象黄浦江里的巨涛翻滚，一种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不由得从心头腾起：决不能坐视不理！

至于应该如何行动？他应该怎么办？他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江水，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军用吉普在他面前嘎然停住，作战处耿处长从车上跳下来，说有紧急情况向他报告。

消息令人吃惊：“工总司”下手了，他们用木棍、铁棒打伤了一百多名到市委和平请愿的赤卫队员！

廖政国的嘴唇都快咬出血来了！他强按住心头的怒火，

听耿处长把这次康平路事件的情况作简要的汇报。
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“上海工人赤卫队”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，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承认“赤卫队”为革命群众组织，要求制止“工总司”打砸抢活动等八条要求。市长曹荻秋到会表态，签字同意了“赤卫队”的要求。

王洪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大会，施加压力，强迫曹荻秋宣布八条作废，目的在于剥夺“赤卫队”活动的权利。

针对王洪文一伙的阴谋诡计，“赤卫队”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曹荻秋同志接见，澄清是非。

张春桥身在北京，却密切关注着上海的一动一静。“赤卫队”的这一行动，他认为正好提供了镇压“赤卫队”，搞垮上海市委的好机会。他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，要王洪文立即调动人马同“赤卫队”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王洪文从热线上接到张春桥的指示后，立即召集“工总司”、“市委机关联络站”等十几个造反队，十几万人，控制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街道，把两万多“赤卫队”队员重重包围起来。

二十九日上午，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，同“赤卫队”进行了谈判，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，问题得到解决。“赤卫队”也准备撤出。

热线那头，张春桥不肯甘休。他在二十九日下午打电话给他老婆李文静说：“赤卫队要夺胜利果实，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，你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。……必要的时候，要他们砸我们的家……对，不是疯，是砸我们的家！你告诉他们，他们会懂的！……”

李文静立即把张春桥的紧急电话指示通知了徐景贤。徐景贤心领神会，顿时亢奋起来，马上向造反派头头作了传达。

经过一番密谋策划，“赤卫队”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的谣言四起。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二时，王洪文带人向赤手空拳的“赤卫队”队员发动了攻击。许多赤卫队员在木棍铁棒的殴打下，鲜血淋漓地从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逃出来。王洪文趁着这股势头，又在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以“工总司”的名义，发布把“赤卫队”各级领导人统统抓起来的“紧急通令”。很快，抓捕了二十余人……

耿处长刚刚介绍完毕，车子就拐进了警备区大院。廖政国当即对耿处长说：“通知有关人员，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！”

会议在警备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召开。廖政国开宗明义：“上海的温度在不断升高，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，为保护上海一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希望大家拿出办法来！”

室外，北风呼号，寒气袭人。室内，气氛紧张，严肃，与会人员讨论得非常热烈认真。

廖政国仿佛置身于过去战争年代战役发起前的军事会议上。他用左手点燃了一支香烟，虽然不时地吸上几口，但始终聚精会神地听取每一个到会人员的发言。

人们心里很清楚，上海是中央三个直辖市之一，是我国东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是长江流域的门户，是我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；是我国一个重要的科技基地和工业基地，是我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。上海的稳定和动乱，不仅对全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！

人们热烈地议论着上海的地位和作用，一个中心议题，一

个唯一的希望，是上海不能乱，更不能大乱！上海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有人说，从上海的历史看，上海曾经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外国的、中国的冒险家们在上海滩上兴风作浪，耀武扬威，长达数十年。解放后，经过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荡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，才使上海面目一新。可是，今天的上海滩会不会再出现新的冒险家呢？

廖政国用手指弹了弹烟灰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他有四进上海的亲身经历，尽管每次的心情不同，感受迥异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：他相信上海将会是人民的上海，上海人民依靠自己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，将会对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。但是，现在……会不会出现新的冒险家，这一提问同样触及了他深藏在内心的隐忧！他深情地望着那个发言的同志，他说得很含蓄，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，这是他完全能够理解的，这决不是懦弱、胆怯，恰恰相反，在当前的形势下，能够公开提出这一疑问，引起大家的警觉，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！

那么，谁是新的冒险家呢？

难道是王洪文一类人吗？不，象王洪文之流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在他看来，王洪文之类不过是群众运动运动上来的一星泡沫，可能瞬息即逝。这是历次群众运动常见的现象。在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新的冒险家是张春桥和姚文元！尽管以前他和张姚二人接触很少，了解不多，他还很难对张姚作出更深刻的判断，但是，以他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，一个保卫大上海，保卫上海一千万人民的警备司令员的崇高职责，使他有一条辨别是非、衡量轻重的最起码、最直观的标准，那就

是上海不能乱！谁妄图把上海搞乱，谁就是最大的大坏蛋！文化大革命仅仅半年时间，上海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安亭事件”；冲市委，斗陈、曹，使各级领导彻底瘫痪。他自己亲眼目睹的抢商店、抢银行那股肆无忌惮的歪风；以及刚刚发生的康平路武斗流血事件，等等，等等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！而从各条情报渠道得到的消息证实，这桩桩件件恰恰和张姚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，是他们在煽动、挑拨、策划，这又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！可是，文化大革命又偏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，是他老人家几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登高一呼，鼓荡起来的巨大浪潮，而且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又偏偏是他老人家身边的……廖政国不敢再放任自己的思路了。

在汽车上，廖政国就和耿处长具体交换了意见。廖政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，不过，他作为司令员不宜在会上出面交底，不留讨论余地，所以由耿处长在会上逐步引上正题：

“工总司前天卧轨，使京沪大动脉中断了三十多个小时，昨天武斗，今天抓人，明天说不定动刀动枪。上海人口那么稠密，一颗手榴弹就可炸倒几十个，那怎么得了？”

这已不是预见中的威胁，而是极其现实的局面。会议室里静极了，人人都在凝神思考，抽烟的同志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发出蜂鸣声的日光灯下缭绕着团团烟雾。

“我最担心的一件事，”耿处长的声调变得更为沉重，“就是上海的民兵手中有数以十万计的武器，不但有自动步枪、手榴弹、轻机枪，还有重机枪、迫击炮！一旦造反派两军对垒，动用起真家伙，请同志们想想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。所以，我建议，我们上海警备区有责任，更有必要采

取非常措施，釜底抽薪，杜绝这种危险的发生！”

“对！今天这个会就是为了这件事，请大家开动脑筋，想办法，集思广益嘛！”

廖政国到这时才点明了会议的主题。他一边点起烟，一边暗示耿处长先别把他们商定的主意抛出来。在关键时刻，在危急关头，当然需要司令员当机立断，一锤定音，但是，要是经过充分讨论，找到更加巧妙、更加妥善的办法不是更好吗？

“张春桥、姚文元过几天就要回上海来了！”侦察处长说，“这是工总司一个头头告诉我的，看来消息可靠。”

这一消息不仅使廖政国吃了一惊，而且会议室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。警备区处以上干部都是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同志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搞法都感到迷惑不解，对张春桥、姚文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。这两个人在北京遥控指挥，尚且能把上海搞得天昏地黑，要是他们坐镇上海，就地指挥，那更不知道要把上海搞成什么样子了。

“我们必须抢在张姚来上海之前，出其不意地把民兵手中的枪支统统收缴起来！”

“恐怕不行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卷进去了，他们会给我们扣上种种大帽子，破坏文化大革命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是一千万人民的生命重要，还是个人的得失重要？”

“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抓住辫子，不能蛮干。”

“对，要找一个借口。”

讨论非常热烈。廖政国一直抽着烟，专心致志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。他表面上仍然是那么冷静沉着，几乎纹丝不动，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极其兴奋而激动，在座的这些生死与共的部下、战友们理解他，支持他，他们所忧虑的不是为他们自己，而是为了他这个司令员，因为谁都明白，一采取这个非常措施，势必把他推上台前和张姚进行面对面的较量，而张姚的背后……

“我提个初步意见，请大家讨论补充。”耿处长望望廖政国，不急不忙地说：“可不可以用检查和维修民兵武器装备的名义收缴武器，这是我们警备区职权范围内的正常工作。”

这一意见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，并且补充了具体的办法，明确了实施的步骤。有人说“要是武器被造反派所控制，公开抗拒，怎么办？”

廖政国拍案而起：

“那就强行收缴，决不手软！一切后果由我廖政国承担！”

会散了。廖政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毫无倦意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踱来踱去。他好象想了很多，又好象一无顾忌。直到耿处长拿了草拟好的《紧急命令》和《布告》送他审阅，他才坐回到办公桌前，戴上老光镜，默默地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。然后，他接过钢笔，用左手庄重地签上“廖政国”三个字。

此时，恰好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子夜一时正。

元旦两天假期过去了。